

# 裴文坦医生：一生为中国

##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裴文坦为中国捐躯七十周年

周星光（耶鲁大学医学院）

裴文坦(W. Winston Pettus)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然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住院医师培训，成为一名前途光明和充满活力的外科医生。1940年，当日军对中国南方发动大规模、残酷无情的攻击时，他响应雅礼协会的迫切召唤，携妻子玛迪(Maude)来到长沙。第二次和第三次长沙会战期间，他俩分别作为外科医生和护士，在湘雅医学院和湘雅医院与其他中西方医护专业同道一起并肩战斗。他们不仅救治了许多中国军人和平民，还保护了成千上万的战争难民。五年半后，他驾驶飞机为湘雅运送援救资金和物资时在贵州黄平遇雾撞山，殒命蓝天，留下他的妻子玛迪和两个女儿安和莎雅，年仅33岁。



玛迪在加州一边当护士，一边独自抚养两个女儿成人。七十余年任凭时境迁移，她心中始终保留着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美好印象，以及他们对待生命的积极态度和沉着精神。



百岁高龄的玛迪登上长城 2014

同时她也相信总有一天会返回中国，与她的丈夫重聚。2001年，雅礼协会的百年庆典之际，她终于回到中国。2014年10月，百岁高龄的玛迪再次返华，在长沙秋天爽烈的艳阳下，她与湘雅医学院共同庆祝百年华诞。这次访问期间，她还首次登上了长城。然而，两次行程中她都没能拜祭她丈夫的墓地。

今年9月3日，应中国政府之邀，玛迪和女儿安(Ann)到北京出席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与此同时，湘雅的员工和校友正在共同努力寻找裴文坦医生的墓地原址。我们希望复建裴文坦的墓地并将他的遗骸安迁在湘雅红楼后的花园内，那是他曾经工作过并为之献出一生的地方。

英雄的裴文坦医生将永远活在湘雅人和中国人民心中！

1912年2月25日，裴文坦出生于上海。像家里的其他人一样，他有一个地道的中国名字：“裴文坦”。他9岁之前生活在上海，1929年于北京高中毕业后，进入耶鲁大学本科就读，之后在耶鲁大学医学院继续深造。他是医学院院长以及名医哈维·库欣博士(Dr. Harvey Cushing)的得意门生。1937年医学院毕业的那天，他与玛迪喜结良缘。她们的蜜月旅行横跨亚欧，在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之时，玛迪第一次参观了北京。

蜜月结束后，裴文坦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长老会医院开始外科住院医师训练。在那里，他从师于著名的外科医生和外科系主任艾伦·惠普尔(Allen Whipple)博士。

完成外科住院医培训后，为了满足长沙抗战的迫切需要，裴文坦医生毅然放弃纽约弗农山(Mount Vernon)医院给他的职位，带着妻子回到了中国。这是在1939年底，当时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9月17日~10月6日)刚刚结束，长沙仍在遭受日军的连番空袭。



1940年6月，去长沙途中

1940年5月底，裴文坦医生和玛迪抵达香港。其时，日本军队已经遍及大部分中国，日军制造的各种恐怖——攻击、空袭、追捕、强奸几乎无处不在。为了避开日本军队和飞机，他们带着行李、书籍和医疗物资，乘坐小帆船漂泊洪水泛滥的河流和险滩，搭载卡车穿越严重破坏的山间公路，徒步跋涉或骑车穿越河堤田野；他们穿山越岭淌河，时而夜晚行进，时而雨中奔波，历时四个星期，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辛。

1940年6月20日，他们终于乘船抵达长沙。在此之前，湘雅医学院已经撤退到贵阳，而湘雅医院和护士学校迁往沅陵和耒阳。留守医院工作的只有一名雅礼协会的医生顾仁博士(Dr. Phil Greene)(裴文坦医生是来接替他)，一名英国医生，多萝西·加尔布雷思博士(Dr. Dorothy Galbraith)，一个俄罗斯牙医，迪米特里·阿弗斯盖博士(Dr. Dimitri Afonsky)，以及肖元定主任('21)和约翰·林博士('36)(Dr. John Lin)。护理人员除了1939年从西储(Western Reserve)护士学校毕业后来到湘雅的玛娇·图克(Marjorie Tooker)外，还有九名中国护士，加上玛迪·裴，他们一起照顾医院的80张床位。



检查一名患者的右腿部溃疡

当裴文坦医生抵达长沙时，湘雅处在战争的前线，经常治疗在日军空袭中受伤的患者和士兵。他很快意识到，血液供应不足是拯救那些重伤员的一个很大的障碍。裴文坦医生在纽约与惠普尔博士和两个输血专家约翰·斯卡德博士（Dr. John Scudder）和查尔斯·德鲁博士



在湘雅医院施行手术

(Dr. Charles Drew) 共事，因此已经掌握了很多输血医学的知识。但是，由于当时中国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思想根深蒂固，任何一种看起来伤及身体的事情都被视为一种罪过，以致对献血存有强烈偏见。裴文坦医生、顾仁博士，甚至玛迪都不得不捐献自己的血液，以挽救病人的生命。当人们知道输血可以救命，血液需求开始增加，西方工作人员的无偿献血变得明显不足。裴文坦医生渐渐萌生了建立湘雅血库的想法，这得到了长沙扶轮社

(Rotary Club) 成员的支持。由于他身先士卒、坚持鼓动，许多起初不愿意的中国员工开始献血，并收集到全院职工中一份 70 位献血志愿者名单。然后，他以一份来自加州圣巴巴拉市的捐款作为起动资金，建立了一个输血基金用以奖励献血者并资助那些负担不起输血费用的病员。1945 年在重庆的湘雅和中央医院工作时，裴文坦医生继续他在普及“献血运动”上的努力，在许多场合下亲自己献血，动员朋友为大的手术献血，并激励员工、医学生和医院职工参与献血。通过他的不懈努力，并在扶轮社、美国红十字会（通过约翰·斯卡德博士）和中国军队医政司的支持下，民国卫生部旋即组建了重庆市血库，以满足各家医院的需求。

1941 年 3 月，裴文坦医生和夫人玛迪前往贵阳、重庆和成都，参观。期间，他在贵阳的湘雅医学院任教三个月。虽然他们在贵阳停留的时间不长，这也是他的第一次教学经历，学生们对裴文坦医生印象非常深刻。正如卢光舜博士写道，“他是个能说会道的老师，有责任心，又充满青春活力。”



裴文坦医生和夫人玛迪在湘雅校园

他们从贵阳回到长沙后不久，日军发起了第二次攻击。9 月 27 日，日军打到长沙城北门。由于当时的湘雅被视为西方的资产，因此湘雅校园被用作避难所，收留了近万名难民。为了保护湘雅财产和难民，裴医生只身与日本军人争执斗争。与此同时，他和肖医生作为仅有的留守医院的医生，照顾着 65 位病重的住院患者并负责难民诊所的日常工作。据肖医生讲述，裴文坦非常同情贫苦的难民，终日扑在工作上，却似乎从未觉得疲惫。



由于他们的努力，日军对湘雅校园破坏不大，只有一些个别的非法闯入和抢劫。其中有一天裴医生在院外工作，一个日本兵冲进医院要进行搜查。玛迪表现得英明而勇敢。她先是让日本兵来她的办公室喝茶吃点心，为肖医生的隐蔽争得了时间。然后当日本兵要求去手术室时，她故意绕道领着日本兵经过收治被炸弹炸伤的重病人病房。结果日本兵看到这些重病人后就空手而去。

第三次长沙会战发生于 1941 年 12 月末，紧接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元旦节时，日军占领了湘雅并利用其建筑作为瞭望台和堡垒从北面攻城。国军原计划要炸平这幢湘雅建筑，多



1942 年被日军破坏湘雅医院花岗岩门匾

亏有三名长沙本地士兵的反对，这项计划最终没有执行。早在圣诞节后，整个湘雅医院已经撤退疏散，一支往北退到益阳，裴文坦夫妇所在的另一支则往南退到湘潭，当时玛迪正怀有七个月身孕。这一队还包括了一些病人、工人和他们的家庭成员。幸好经过一周苦战，日军被赶出了长沙。但是，1942 年

1 月 4 日，日军撤退时烧毁了湘雅医院大楼，两个校区房屋建筑焚毁殆尽，面目全非，几近片瓦不存。裴文坦医生描述当时满目疮痍的废墟为“毕生的震惊”——当他骑自行车赶回长沙，走出北门，来到这幢曾为长沙地标性建筑前时，他竟然不能认出来，直到他返回并反复看了三次才辨认清楚。作为第一位返回的人员，他带领工人一起修复和保护湘雅资产，并在其他的人员陆续返回之前开始收治病员。正是由于他的努力，在医院严重损毁后医疗工作能迅速恢复并继续开展。

1942 年夏，玛迪生下第一个小孩安不久，裴文坦医生去益阳途中不幸感染了血吸虫病。经过几个月治疗，他的病情未见好转。1943 年 2 月，他随同玛迪、女儿安一起乘坐没有氧气的飞机途经缅甸到印度就医。由于在那儿也不能得到需要的药品和治疗，他们又登上了一艘货轮回美国接收长疗程的治疗。在旧金山的那一年里，他在伯克利继续学习中文并在当地医院外科观摩。他还参加了反日战争募款，并在这些活动中演唱中文歌曲。1944 年春，他完全康复，带领全家



宣传中国在战争中的努力贡献并演唱中国歌曲，奥克兰地区，1943 年 3 月

到圣路易斯，他在巴雷斯医院（Barnes Hospital）接收了为期 6 个月的胸外科训练，目的是要掌握治疗在中国泛滥的结核病的技能。不久后在重庆陆军医院，他运用这些技能治疗了许多

病人。在圣路易斯这段时期，他还获得了飞行员执照。

与此同时，中日战争已经打到了炽热阶段，日军正在试图纵穿中国并建立一条通往南疆和东南亚的铁路走廊。这项计划被称为“打通大陆作战”（又称“一号作战”）。1944年5月27日，日军在湖南聚集了其全部军队30%的兵力，对长沙发动了第四次攻击，这就是第二次中日战争中最大规模的战役——长衡会战。肖医生和护士长图克女士将医院退避到石潭，再到沅陵和安化。随着战争伤亡人数的攀升，湘雅医院和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专业医护人员。



裴文坦一家在英伍镇，1944年

九月，在他的第二个女儿莎雅出生后不久，裴文坦医生获得了胸外科医生证书。他赶到西维吉尼亚的英伍镇，玛迪正在那儿进行产后恢复。短暂的家庭团聚后，他还远未恢复失去的体重。尽管已经履行完在长沙的义务，他还是准备再次响应来自中国的迫切召唤。但在当时，美国政府不允许妇孺去往中国战区。裴文坦不得不做出艰难决定，离开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女儿，只身前往中国。因为他知道，中国更加绝望地需要他。十一月初的一个寒风凛冽的早晨，远洋轮又一次载着裴文坦医生离开纽约驶向广袤

的大西洋深处，去往一个迫切需要他的才华、技能和奉献的国家。玛迪对他的丈夫挥手作别，她没有想到，这是他们的永别。

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裴文坦于1944年12月抵达印度。日军当时正在向中国西南推进，张孝骞院长已经带领医学院第二次西迁，从贵阳到重庆。几个星期的等待之后，裴医生踏上了一架美国空军驼峰航线的飞机。这条航线是当时中国同世界联系的唯一渠道。1945年1月，裴文坦医生终于经成都抵达重庆，随身他再次为湘雅带去了近一吨的药品、设备和书籍。

到达重庆后不久，裴文坦医生从美军处借到几辆卡车，并与张孝骞院长驱车前往贵阳。他们带回来了24吨仪器设备，以及在撤离时遗弃的一辆汽车和一辆救护车。在重庆期间，他既要在医学院教学，又同时在中央医院和陆军医院担任外科医生。当时医院挤满了受伤的士兵和平民，经常需要长时工作。有一次他在30小时内连续做了8台手术。在作为教学医院的重庆中央医院，



与张孝骞在去贵阳的途中，1945年1月

他与学生们一起挤在临时宿舍。为了给住院医师讲课，他花很多时间在晚上通勤——驾车、步行到河岸，搭乘轮渡过江，还经常准备讲义到深夜。据在重庆与他一起共事的好友吴执中医生描述，他的讲义简洁、更新快，令人印象深刻。此外，他还担任张孝骞院长的外事秘书长。他也是重庆血库得以建立的功臣。随后他又参与了由中国陆军医务部和美国空军共同在芷江建立湘雅医院的计划。因为日军在八月份投降，这一计划最终没有实行。

随着抗日战争的接近结束，裴文坦医生协助张孝骞院长筹备湘雅重返长沙的回迁工作。由于他与美军及其各地的医院都有着广泛的联系，他负责的筹款工作取得巨大成功，并争取到了大量的药品、物资和医疗用品，以及一些救护车和卡车。例如，



裴文坦在治疗病人，重庆 1945

他从国际救援委员会筹集到 4,000,000 元的旧币资金用于湘雅的重建；九月的一天，他步行 8 英里到芷江附近的美军药房取到 400 单位的血浆，并将其送到沅陵；他从美军战时运输委员会争取到了 8 辆卡车用于帮助湘雅的转运；又有一次，他从中国战区作战司令部弄到 2 辆 5 吨十轮军用大卡车，并与雅礼的莫里郎德（Ken Moreland）先生一起驱车三天，从芷江的医疗供应仓库开到长沙，两辆大卡车加挂车满载医疗用品。他的这些努力对于湘雅的快速重建、重新开业以及一年后回迁长沙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他人生的最后几个月里，他辗转奔波于重庆、芷江、沅陵、上海、昆明和长沙。正如他写给玛迪的信中所说：

“张医生认为我对学校最大的益处就是奔波全国各地，使湘雅各个单位保持联系，为湘雅重建争取援助，并尽可能地搜集医疗用品……也许当我有妻子和两个女儿的照顾时，我会在某处安定下来，再次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公民。”

因为他经常与美国空军随行，并且是他们的官方摄影师，在日军从长沙撤退之前，他被指派负责评估湘雅的受损情况并运送湘雅重建的资金和物资。

1945 年 9 月 4 日，裴文坦医生被派遣去长沙评估湘雅的情况并同时保护医院财产免遭日军撤退时被破坏。这是在日本于东京签署投降协议之后，但在中国军队接管长沙之前。他的飞机降落在岳麓山南边的江岸后，被日军俘虏并扣留在岳麓山区好些时日。幸运的是，他偶遇了李先生。李是图克女士的厨师，他们是在日军宪兵押解他去见上级时相遇的。通过李先生，裴文坦医生又联系上了医院的一些其他工人。几天后，中国军队进驻长沙，他随即仔细检查了



校园并且立即与医院工人一起开始着手保护医院的财产。由于日本军队仍住在校园，破坏抢劫，他不得不周旋于两国军队和他们的将军之间。最后他得到了一位美军陆军上校的帮助，得以震慑日军士兵，阻止了日军进一步的破坏活动，甚至使他们帮助清扫校园。不仅如此，他还帮助保护市内的其他医院。10 天后，刘泽民医生和盛群驿先生从沅陵返回，分别接管了医院和雅礼中学的这些工作。10 月 11 日，湘雅医院重新开业。

几天后，裴文坦应中国国军(胡琏将军)邀请见证了日军在湖南的投降仪式，拍摄了许多历史性照片。



裴文坦在湖南拍摄日军的投降仪式, 1945

对于裴文坦医生，湘雅和它的重建是如此的富有前景和希望，他非常希望继续在长沙服务。他在 9 月给玛迪的一封信上写道：“现在可以放心的预言当你和女儿们来的时候，生活会很安全，经济上也能负担家里所有的费用。所以如果你还没开始的话，我希望你能立即准备，取得护照并制定过来的计划.....你的到来必然会很壮观，好多中国朋友都询问你何时能来。”

不久后的 10 月 26 日，他在上海继续写道：“明天早上我要飞往重庆.....为等飞机在这个可爱的地方多呆几天固然很好，但我已迫不及待地想在你到来时再回这里（希望是在湘雅的飞机上）来接你。那时我们的生活就完整了。”

由于战时运输系统毁坏严重，远不能满足需求，裴文坦医生说服了美军以极低的价格出售两辆飞机给湘雅医院，以帮助湘雅的重建和搬迁。他花费大量时间驱车或驾机穿越近半个中国，他知道陆地上一个月的路程飞机一天可以走完，因此他清楚地意识到，在即将到来的几年中，这两架飞机对于湘雅的搬迁和重建有多么重要。此外，他也设想这些飞机还可以作为“空中救护机”，这对于医疗转运将是无价之宝，特别是用于边远的地区和险劣的地形。这是一个何等宏伟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对于湘雅或中国来说都是太超前，并且以悲剧为终局。经过与美军反复博弈和繁琐的手续，裴文坦终于代表湘雅获得了两架飞机。两周后的 11 月 13 日，他驾驶其中的一架，带着湘雅重建的部分资金和物资从重庆起飞。在这最后一次航程之前，他去陆军医院给卢医生留了字条，说到他将在



与 L-5 军机合影，重庆，1945

在这最后一次航程之前，他去陆军医院给卢医生留了字条，说到他将在

2-3 周后返回。在昆明和贵阳停留后，他继续飞往长沙。对于 L5 型飞机，这是一条危险的航行路线——由于缺乏云层上飞行的设备，因此它不得不在云层与高山之间狭窄的空间中穿行。不幸的是，在他起飞后天气突变，大雾袭来，他的飞机撞到距黄平约 10 英里的一座山上。这一天是 1945 年 11 月 18 日。



长眠于湘雅医院，长沙，1946 年 1 月

裴文坦医生的一生使许多人深受感动——学生、医务人员、病人、战士、普通员工和政府官员。正如张孝骞医生所写：“重庆的湘雅社区都陷入了不可估量的悲痛中……裴文坦医生无私、无畏、无限的牺牲精神，将永远激励湘雅师生。”1945 年 12 月 9 日，长沙的湘雅社区为他举办了追悼会。次年 1 月，他的遗体被迁回长沙，安葬于湘雅医院的北墙附近，与老

医学院大楼（福庆楼）的西入口相对。在白色的湖南大理石墓碑上镌刻着：他倾其所有，把伟大的勇气、无比的热忱、横溢的才华都奉献在这里。我们——他满怀感激的同事、学生、朋友们，将永志不忘！

#### 附录：裴文坦医生墓碑和墓文



院长张孝骞(右), 护士长斯克莱和一名医生在裴文坦墓前, 1946



# W.WINSTON PETTUS, M.D

FEBRUARY 25, 1912      NOVEMBER 18, 1945

## YALE – CHINA HSIANG-YA

HE GAVE HIS BEST WITH COURAGE,  
ZEST AND SKILL, AND WE, HIS  
GRATEFUL COLLEAGUES, STUDENTS  
AND FRIENDS, WILL NOT FORGET

猗 妻 黃 驅 時 家 歸 裴 裴  
歟 女 平 梭 世 虔 國 文 文  
裴 翌 遇 湘 戰 信 習 坦 坦  
君 年 霧 渝 方 基 醫 博 教  
中 一 機 間 熾 督 畢 士 授  
外 月 毀 一 迨 一 業 籍 墓  
典 九 殉 九 日 九 雅 隸 碑  
國 型 日 職 四 本 四 禮 美  
立 身 瘞 年 五 屈 零 大 國  
湘 雖 骸 三 年 降 年 學 生  
雅 隕 院 十 十 君 來 為 於  
醫 而 內 有 一 為 華 胸 滬  
學 精 銘 三 月 院 任 部 長  
院 靈 曰 遺 十 運 教 外 於  
謹 永 父 八 輸 本 科 燕  
立 存 母 日 屢 院 專 壯

### 致谢

湘雅医院国际医疗部外科医师董超（湘雅 04 级）在协助将原文译成中文过程中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在此深表感谢。也感谢下列校友协助碑文辨认： Drs. 李家贤，唐莎琳，董超，黄珊琦教授。

### 参考文献

*Dauntless adventurer – the story of Winston Pettus* by Edward Hume, M.D. 1952

*Maudie and Win – Ten good years* by Linda Bordner 2015

Archives of Yale-in-China, Yale 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

Archives of Xiangya Hospital

Wikipedia